



吴重熹的红十字会情结

任连巨

吴重熹(1838年—1918年),字仲怡,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次子,山东海丰(今无棣)城里村人。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历官工部郎中、陈州知府、开封知府、福建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保奏,以侍郎衔任驻沪办电政大臣,主持收回中国电报总局官办之事。次年日俄战争爆发,历史性地他将吴重熹、吕海寰、盛宣怀等人推到了开创中国红十字会基业的前沿,共同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传奇而瑰丽的一页。

红十字会运动起源于欧洲。1859年10月在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的呼吁、运作下,欧洲16国代表在日内瓦召开首次外交会议,并一致通过了《红十字决议》。1880年该组织正式定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当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时,中国社会仍处于半封闭状态,但许多有识之士对创建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了大力宣传和积极探索。作为洞悉国内外大势,极欲励精图治、报效国家的吴重熹,在知河南陈州、开封,后转职福建、直隶期间,对红十字会产生浓厚兴趣。

中国红十字会的真正发端,源于清末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和沙俄为争夺中国东北三省和朝鲜半岛而进行的战争。然而,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力难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竟将辽东划为交战区,宣布“局外中立”,只呼吁交战双方尊重清朝在盛京(沈阳)的陵寝,而对无辜被难的数百万东北民众生命、财产视为草芥,漠然置之。战争甫始,直隶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派出大队船只前往旅顺、营口等处,拟救难民出险,不料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竟称,各口岸已经封闭,不准别国船只驶进。袁世凯、周馥等诚恐阻格朝廷坚守中立之局,遂不敢轻举妄动。

看到转来的奉、吉抚台、军宪及多位外国教会友人的函电,让吴重熹心情沉重,夜难能寐。辗转悻悻中,吴重熹数次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增祺等通电,询问战争状况,特别是奉吉两省黎庶被难情况,并“恳请”袁世凯、增祺等大员,将东北战事及时、如实奏报朝廷,禀请谕令东北战区各级官员恪尽职守,想方设法救护逃难群众。他还多次前往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1843年—1927年,山东莱州人)、盛宣怀(1844年—1916年,江苏常州人)官邸,商讨如何拯救东北百姓免受战争磨难之苦,尽量减少群众伤亡。

正在吴重熹、吕海寰、盛宣怀三位钦差苦思冥想,探讨对策之际,一则消息传来,让他们沉重的心情略为宽慰。

提议创建红十字会的发起人,为时任上海记名海关道沈敦和(1866年—1920年,浙江宁波人)。日俄战事发生后,沈敦和激于义愤,与居沪的直隶候补道施则敬(1855年—1924年,江苏吴县人)、四川川东道任锡汾(?—1918年,江苏宜兴人)等人奔走联络,援引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善款,以定赈救北方难民之策。

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五日(1904年3月1日),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不及与家人同度元宵佳节,携手拜会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面禀创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事宜。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表示全力支持,立即奏报朝廷,并嘱派招商局参议杨士琦前去联系,力将事情办妥。

1904年3月3日,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等22人集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尽管该会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基本规则,但性质仍属“善会”,没有“约章”的保驾护航,贸然深入战地,无法得到交战双方的保护。

面对“善会”遇到的窘境,吴重熹受吕海寰、盛宣怀之托,立即电函袁世凯。二人素吴、袁有师生之谊,而袁世凯对吴重熹一向敬重,吴重熹之言语,比及他人,袁世凯更能引起重视。

由是,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位钦差出面联系驻沪英法德美领事,开明宗义,希图襄助。然而,对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事,四国领事并不想太多干预。吴重熹知道力争尽快创办一个得到西方大国支持、最终赢得国际红十字会同意的仁会组织,此时此刻仅仅凭借中国官员的“面子”,难度非常大。因此,按照吴重熹的要求,沈敦和立即联系自己的好友、时任上海广学会主持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年—1919年),请其出面相助。李提摩太一口应允。1904年3月10日,在吴重熹等人全力支持下,由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作为主要发起人,由英法德美代表参加,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今上海市黄浦区江西中路215号)举行集会,宣布成立由

中英法德美共同参与的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

为了彰显“中西合办”的特色,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采取董事会制,由45位中外董事组成,其中外国董事35人,中国董事11人,并从中再推荐9名“办事总董”,负责红十字会各项事务具体执行,其中西方总董7人,中方总董为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补选)。

清廷对设立红十字会组织给予肯定,命袁世凯与上海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位钦差“详细熟筹”,但又担心官办有违本国中立,因而属属民办在明,朝廷暗中支持,并答应“所需经费,可由公家酌拨”。

1904年3月17日下午5时许,红十字会办事总董在盆汤弄丝业会馆(今上海市山西南路255号)首次集会,决议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易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因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人系朝廷大臣,不便出席盛会,但会议通过的各项议程,都由三人审核、厘定。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人的作用主要是沟通红十字会与中央政府及各部、地方督抚的联系,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解决一些需要协力合办的事情,起到集体领导的作用。

日俄战争后,电函成为传递战事、救护情况,上传下达,最便捷的方式。作为电政大臣,吴重熹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将救援赈济事宜及时、快速奏报清廷、通告各地督抚。为此,他首先电禀袁世凯,经袁应允后,将所有关于红十字会三十字以内的来往电函一律免费。但随着战局的深入和救护工作的开展,红会电函日趋频繁,很多电文并不是十几字、三十字所能表述清楚的。为此,施则敬电禀商部,恳求“上峰”请商吴重熹:所有关于红十字会往来电函,不论字数多少,费用一律减免。

电函件数增多,字数不限一概减免费用,无疑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这一点,吴重熹心里很清楚,本意也极愿减免,但他不能私自做主,只能听任中枢指令。这次,中枢“格外开恩”,全部予以减免,何乐而不为,自当着力执行为是。但他又担心因为不收费,各地各部门电文恣意冗长,造成的损失更大,因此他专门叮嘱具体承办人电文该长则长,能短则短,一切以叙述完整,又简明扼要为原则。

不仅如此,吴重熹等还一并奏请清廷,给出险入关的被难百姓,一概减免火车、乘船费用,并酌情发给川资。

1904年3月29日,由吕海寰领衔,盛宣怀、吴重熹、杨士琦、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知名人士联合签署了《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即元电)。该通告知全国各界、全体同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已得到政府承认,倡议国人立即付诸行动,积极筹措救护和赈济事宜。

为发挥表率作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立不久,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大臣及参与红会的中外会员、办事人员等首先主动捐助,数天内募集白银5万余两。

通电发出后,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外务部官员捐银1200两,盛京将军增祺助银1万两,两江总督按察平银8000两、漕运总督3000两,广东、天津各2万两,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各1万两,河南、陕西各5000两等,还有部分使领馆捐助,一个多月募银20万两及大宗物资。

经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研究允准,凡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济灾区的物资、药品统由轮船招商局免费运至天津,交由天津分会负责分发、运输灾区。

时间紧迫,救援任重,各项募捐必须走在前面,以应战区不时之需。在吴重熹的亲自主持下,《申报》于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904年4月9日)刊登《劝捐万国红十字会经费申报馆协赈所谨启》。

吴重熹因早年知陈州、开封时,数次督率民众抗御水灾,有时十几天腿脚浸于泥水,落下足疾,每逢阴雨天气,便隐隐作疼,后在江宁、福建任职时,潮湿常年相伴,陈病时有发作,只能以药减缓病痛。此时,连日操持,旦夕疲累,饮食不周,已让六十七岁的他身体难以支撑。但在国运衰微、黎庶蒙难之际,他仍然秉持一颗博大而仁爱之心,或乘车,或拄拐,或步行,不辞劳顿地宣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并凭借自己的“钦差”身份协商、鼓励、号召各省督府、上海本埠商贾、驻沪绅商,及海外华人华侨慷慨解囊,捐赠善款,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匡时救难。

早在一个月前,吴重熹即修函速递于外官江苏、河南、广东的三子吴崧、吴封、吴翮,要求他们“垂范在身躬,引领在前行”,于所属辖地多加劝

导、倡捐,共襄义举。吴重熹还与吕海寰商议,在刚刚集资兴建中的山东会馆(今上海市卢湾区自忠路455号)召开募捐大会。由鲁商在沪创建的“南市公估局”“广记”“六吉”“怡顺昌”“正祥同”“公和通”等商号都予以慷慨解囊。同时,吴重熹还与好友、浙江义商严信厚取得联系,促其在“四明公所”(宁波在上海的同乡会馆)及汉口宁波商会、金陵宁波商会等,开展劝募募捐活动。

对于创办红十字会这一历史首举,清政府不仅口头上予以支持,并于1904年5月24日慈禧太后颁布懿旨,拨付白银十万两以作经费。清廷的积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所有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让吴重熹等大臣吃了“定心丸”。

吴重熹考虑到日俄战争日趋激烈,被难人员日增。在战区抢运伤员,分会和外国教士等仅仅凭借几副担架,断然不能。为此,他向吕海寰、盛宣怀提议,电函商部、外务部,拟购救护车。

考虑到中国红会早日跻身国际红十字会,吴重熹向吕海寰、盛宣怀提议,抓紧制定适合本国的有关章程,成为上海红会的行动纲领。吕海寰责成吴重熹立即以三大臣之名致电外务部、商部。

为进一步完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工作,促使各项活动走向正轨,在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位钦差的督理下,几经商榷、修改,于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颁布《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并在六月十七、十八日《申报》予以刊登。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日(1904年8月12日),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会长穆业、副会长欧第业联名为中国入会一事复函:中国入会一事,瑞士业已成就,瑞士联邦已按照万国公例在约各国。

正是由于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一干朝臣的身体力行,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仁人善士的劳心劳力,中华大地“一时间风起,中外乐输者尤不乏人”。据统计,日俄战争期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共筹中西募捐白银54.19万两,并全部用于拯救中外难民,共救济(包括收容、遣送、治疗、赈济)战区难民总人数达到46.7万人。

三年后,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向清廷合奏一折,陈述创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过程、经历、各级官员士绅万众一心募捐、红会积极开展施救、赈济情况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效,奏请奖叙“在事出力员绅”。此折还详细谈及了在上海购地建造国人自己的医院和医学堂的设计构想和举措,目的就是“以结万国红十字会之全局,即以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

宣统元年(1909)初,吕海寰与时任河南巡抚的吴重熹通电取得共识。正月十八日(2月8日),会奏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六条),请旨立案。

是年夏初,应沈敦和盛邀,时任河南巡抚的吴重熹百忙中挤出三天时间,赶赴上海,视察已经正式投入运营的红十字会总医院,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医学堂。二人回忆起数年前为创办红会宵旰相继、同甘共苦的岁月,不胜感慨,期盼中国红十字会早日跻身国际红十字会大家庭,为救死扶伤发挥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1月1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通报承认并接纳中国,就此中国正式加入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此时,吴重熹已经寓居天津,专事古籍、家族资料的刊刻。2023年12月26日,吴重熹曾孙吴朴承在接受无棣乡友采访时坦言(他也是听父亲吴保镛讲),当听到ICRC通报承认并接纳中国,中国正式加入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消息后,数年滴酒不沾的吴重熹喜形于色,破例饮酒一盅。

主要参考资料

- 池子华著《红十字运动:历史与发展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
-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大清万国红十字会档案》(第1册),2009年3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3月第1版
- 1924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印行《中国红十字会20周年纪念册》
- 从延锡、邢金锋主编《中国红十字会先驱吴重熹》,中国文史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



黄河三角洲诗词

麦收(新韵)

张成江
千里浪翻一片黄,收割机阵笑声扬。
忆昔人力累多日,今岁半时粮满仓。

端午节

杲仁华
千家万户粽飘香,泪水倾波祭国殇。
魂洒江河今更在,骚歌九曲唱端阳。

忆儿时端午(新韵)

韩淑静
麦收之夜忆端阳,米粽青青水杏黄。
未解赴池游子意,只言焚艾画帘香。
腕缠彩线夸佳饰,额点朱砂炫靓妆。
转瞬小娃霜鬓,些些童趣梦中藏。

甲辰端午抒怀(新韵)

钱杰
可叹湘江葬孽臣,忠奸难辨苦君昏。
从来正气盈虚野,哪许妖风扫士林。
瑞虎声闻千里谷,祥龙鳞耀万层云。
今朝又撰屈平赋,为赞河山景象新。

过赵瓦村和园

卢玉莲
葡萄碧涨小荷新,淡淡浮香妙可论。
十里薰风开画障,满天清气托青筠。
诗花绽处檐飞彩,韵韵浓时味自醇。
到此江郎应有叹,愧无才笔敢重申。

端午吟怀

唐海民
年年蜜粽香,舟赛亦疯狂。
不解郢都事,怎知屈子伤。
高怀须永记,傲骨待弘扬。
艾草频招手,邀君诵九章。

寻诗遇鱼翁(新韵)

高惠娟
一湖碧水荡清波,郊外人稀不见车。
惟有桥边闲钓客,心随漂动盼鱼多。

临江仙·垂钓(新韵)

王涛
碧水清芦翠柳,和风丽日微云。池塘边上养精神。短竿擎钓趣,青眼探浮沉。
长线抛开琐事,弯钩钓起童心。依稀昨日眼前真。鱼儿今负我,我负旧时春。

卜算子 乡村初夏

郭新坡
五月热风来,日晚鸣青蝉。时响蛙声似鼓敲,唱熟村南麦。
蚕宝醒仍眠,只怕床帘窄。紫葢枝头引雀啼,急把窗纱拆。

农家看麦熟

李同和
千顷田原禾黍黄,四方麦客各着装。
农人采穗数新粒,信手揉成一捧香。

夏晨即景(新韵)

王金英
叶茂枝繁果欲圆,绿林漫步觅诗篇。
忽闻一阵鸟鸣脆,原是红霞铺满天。

航空学院得句(新韵)

马景田
如画学庭景色幽,小桥碧水绕琼楼。
迷人更有神奇处,展翅银鹰壮志遒。

落霞

隆新霞
落日余晖彩影留,无边美景望中收。
川如色染涌金浪,云似火烧成赤绸。
几只渔船斜照里,两三沙鹭老滩头。
满天霞映千山画,迷煞尘间万众眸。